

山东邮电史稿

上 册

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复制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前 言

山东人民邮电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重考验，以及建国后的积极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为了真实地记载山东解放区战时邮局和电话站在对敌斗争中的光荣史迹，及十年来山东邮电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纪念那些在完成战时通信任务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和艰苦奋斗的老同志，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揭发和批判旧邮电企业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反动本质；总结山东劳动人民在发展邮电事业上的经验教训，以便教育全省的广大邮电职工，我们编写了这本山东邮电史稿，供各地邮电职工学习参考。

这本史稿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邮驿史料”、“中国邮电航空史”、“中国之电 事业”、“交通史邮政编”，1904—1943年的~~历史~~公报或年版，以及山东战时邮局的档案和老同志提供的革命回忆录和转战南北随身携带多年的宝贵文件。按照历史年限分为古代通信、近代邮电、战时邮电和人民邮电等四章记述。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史料不全，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们向支援这次编写工作的上海市档案馆和山东战邮的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邮电史稿(草稿)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代通信	(6)
第一节 原始的通信工具和驿站	(6)
一、烽火报警和刁斗传令	(6)
二、驿站传递	(7)
第二节 民信局和文报局	(17)
一、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	(17)
二、文报局的出现	(25)
第二章 近代邮电	(27)
第一节 近代邮政的产生和发展	(27)
一、帝国主义“客邮”的侵入	(27)
二、递信官局的开办和大清邮政的建立	(32)
三、旧“中华邮政”的发展	(37)
第二节 电报电话的传入和旧电信事业	(50)
一、电报通信	(50)
二、市内电话	(65)
三、长途电话	(69)
四、省有长途电话	(76)

第三章 战时邮电	(83)
第一节 解放区战时邮政的创建和发展	(83)
一、 抗战初期的通信组织	(83)
二、 交通线的建立和交通路线的开辟	(85)
三、 战时邮局的建立和成长	(89)
四、 整风和生产运动的开展	(96)
五、 第一次战邮工作会议的召开	(99)
六、 建立交通线，保证根据地的通信联系	(102)
七、 武装交通	(111)
八、 报刊发行工作的开展	(115)
九、 业务考核制度的建立	(126)
十、 创模选模运动	(133)
十一、 和平局势的出现和交通总局的成立	(140)
十二、 内战爆发，扩大军邮组织，支援战争	(146)
十三、 配合政治宣传攻势，猛烈开展敌区发行工作	(153)
十四、 开展整党运动，整顿邮电干部队伍	(165)
十五、 实行企业化管理，为战后邮电建设做好准备	(168)
十六、 战邮干部队伍的成长壮大	(174)
十七、 邮工自己的组织—邮务职工会	(181)
十八、 战邮的内部刊物—邮报	(190)

附录：	()
一、 永垂不朽的战邮烈士	()
二、 英雄模范事迹	()

三、烈士名单	()
第二节 解放区的电信通信	(194)
一、抗日战争初期的电信通信	(194)
二、无线电讯的发展	(199)
三、电话通信的发展	(202)
四、有线电信的恢复和发展	(209)
第三节 日伪政权下的“中华邮政”	(213)
一、叛国投敌，为虎作伥	(213)
二、在铁蹄下勉强维持	(215)
第四节 伪“华北邮电”管辖下的山东电信	(217)
一、渤海初期的接管和强行霸占	(217)
二、进一步伪化与加强控制	(218)
第五节 旧邮电事业的没落	(219)
一、网路支离破碎	(219)
二、接管和初步改造	(221)
第四章 人民邮电	(1)
第一节 改造旧企业，恢复和发展邮电通信	(1)
一、对旧邮电企业的改造	(1)
二、邮电网路的恢复和发展	(7)
第二节 改善企业管理，适应经济建设的通信需要	(26)
一、邮电企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	(26)
二、建立责任制度	(27)
三、建立健全业务技术管理制度	(30)
四、加强经济管理工作	(39)

五、改进乡村邮政通信工作	(50)
六、广泛深入地开展劳动竞赛	(58)
七、整顿劳动组织	(64)
八、建成以省会为中心的邮电网	(68)
九、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83)
第三节 大搞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跃进再跃进	(87)
一、鼓足干劲赶“东四”	(87)
二、破旧立新争上游	(91)
三、冲天的干劲，无穷的智慧	(99)
四、巨大的力量，辉煌的成就	(108)
第四节 邮电职工队伍的发展壮大	(128)
一、邮电职工的队伍成长壮大	(128)
二、干部的培养教育	(132)
三、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141)
四、劳动保护工作的加强	(150)

第一章 古代通信

第一节 原始的通信工具和驿站

一、烽火报警和刁斗传众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以前，在夏殷等朝代，在山东沿海边防和主要城市就有了烽火台的设置。凡遇敌人入侵或内部变乱等紧急情况，便在烽火台上燃起烽火，直冲云霄，使各地诸侯驻军看见烽火，就知道这里发生战乱，赶来救援。据传说：现在烟台市东海沿的烟台山，古时就是一个烽火台，烟台山的名称就是从此得来；胶县当地也有古代烽火台的遗迹。唐朝诗人作的“古从军行”的诗里，有“白日登山望烽火”一句；杜甫的“春望”也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都是指的这种烽火。另外还有一种古代军队的行军用具，名叫刁斗，它的作用和更鼓一样。在夜间有事或者发现军情，敲击起来，作为信号，借以警众报时，这些都是中国最古老的通信方法，也可以说是通信工具的起源。

从上面所述的情况来看，烽火和刁斗这两种原始通信工具，主要是为了适应部队和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山东在黄河流域的下游，是汉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是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当时，诸侯争战频繁，对烽火和刁斗的利用是很多。

的，可惜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关于烽火和刁斗在山东的发生发展情形，暂时还没有确切可靠的资料可考，所以在这里只能简略的介绍一下。

二、驿站传递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公文的组织，根据有史可查的资料，开始于周代。周武王即位以后，分封了许多诸侯，为了巩固他的封建统治，管理这些分散的诸侯王国，无论传达命令，或向皇帝进贡财物，伎臣聘向，接待宾客等等，都需要比较健全的通信联络组织，这就产生了传递公文信件的官邮，当时叫做“邮”“置”。按照杨升菴引古注解释说：“古注 置驿也，邮，驲也。置缓而邮速，驲速而驲疾。置有安置意，犹云日行一程。邮有过而不递意，犹云倍道兼行，言速驰也。”这里的“邮”是用马传递，所以速度较快；“置”是步行传递，比较慢。都是邮驿制度的一种，在周代由夏官大司马管理。当时驿程以三十里为一舍。“周礼”：“遣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山东通志》上共防患的驿递部分，她说：“周礼路设候馆以待宾客”。路室就是驿吏休息的地方，候馆就是驿道沿途招待过往官商旅客的地方，~~也是~~是属于驿站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前七百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时和时战，信使往返，对邮驿的需要更

加广泛。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²。说明邮驿制度，当时在山东不仅相当普遍，而且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德之流行”与“置邮而传命”相提并论；用邮驿传递的迅速来比喻德行传播影响之快。不过当时战争频繁，从中央到各诸侯王国的邮驿交通，已经不能保持周代原来的完整面貌。根据“春秋”一书（鲁国（即现在山东的）历史记载，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期间（纪公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各诸侯王国之间，军事行动有四百八十四次；朝聘（就是大国强迫小国遣使贡纳财物）和盟会（各大国利用邮驿酋长会议来解决小国朝聘问题）有四百五十次之多。这就无形中说明了当时对于邮驿的需要。再从郑国大商人弦高路遇秦兵伐郑，派人乘坐邮驿车马，星夜赶回郑都报告来看，也证明西周的中央邮驿制度虽然遭到破坏，不如以前完整，可是各个诸侯王国还是保持着相当完备的邮驿组织。

除了这些官家设置的邮驿，在当时的豪绅贵族中，也有私人办理的邮驿，就是私邮。战国时的四公子都设置了私邮，其中齐国（即现在山东的中部，淄博、淄川一带）孟尝君的私邮就办得非常完备，设有专管私邮的官吏，叫做“传舍长”。相传魏国公子无忌（信陵君）有一天和魏王奕棋，忽然魏国官邮送来消息说北方边境上举了烽火，赵国发动兵事，将要进入魏国疆界了。魏王马上停止博奕，想要召集大臣商议。可是，信陵君却很安闲地向魏王说，这是赵

王打猎，不是攻打魏国，劝魏王不必召集大臣商议，但是魏王心里有事，深怕赵兵打过来，虽在继续奕棋，却已心不在焉。不久，第二次官邮又来报信，证实是赵王打猎，并不是出兵犯魏。魏王大惊，问信陵君何以知道这样清楚。信陵君回答说：“我的消息是由‘食客’探知赵王私事，所以我晓得的比官邮较真较早”。象这种私邮制度，到了汉朝还有。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以后，拥有广大疆域。筑长城，修驰道，“书同文”（统一文字），“车同轨”（统一交通工具）、开河渠、兴漕运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促进了邮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因此，秦代邮驿制度规模较大，费用也较多，而且还制定了邮驿律令。

“汉承秦制”，汉朝的邮驿制度大都继承秦代旧制。只是邮驿的名称汉朝以前都叫邮，到了汉朝，才开始改为“驿”。朝廷设督邮掌管驿政，每处驿站都设有专官管理。不过当时的驿站没有车马设备，比起秦代要节省多了。到纪元前一百四十年至八十七年，汉武帝时，邮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仅是管理国家所需要，并且用来对外与中亚细亚各国联系。

三国、魏、晋和南北朝的三百年间，战乱频繁，全国统一的邮驿制度已经不存在。东晋时“邮驿共置”，有步递也有马递，每县置属两处，寄递文书。

隋朝仍然恢复汉驿制度，隋炀帝筑驰道，开运河、巡幸四方，都促进了邮驿交通的发展。因此，隋朝的邮驿

典制规章相当完善，开拓了唐驿的盛大规模。

唐朝的邮驿制度是根源于隋，规模远远超过汉代。当时全国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个驿站，其中：水驿一百六十所，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陆相兼的驿站八十六所。驿程每驿三十里，每天行程里数都有一定。“唐会要”卷八十七载：“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宜者，沂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沂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余底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木浅，不得行驶，即于隧道官司中牒折即记，听折半。”至于驿券及信牌，有头子、银牌、金牌、青字及红字等牌，牌券到的地方，看见的人都要让路。当时，日本曾经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邮驿，日本的古驿制度就是继承了唐驿。可是唐驿也和其他朝代的邮驿组织一样，是由封建朝廷举办和专用的，专门传递朝廷官府的公文和军事传报，有时也传递各地给朝廷的贡品和接送官员。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担负着驿站马料，建筑驿舍及邮道的维持等沉重的负担，也需要通信，但却丝毫不能利用驿站寄递信件。唐明皇的宠妃杨贵妃喜欢吃鲜荔枝，唐明皇就为她专设驿站，从长安到四川涪州，昼夜驰驿，赶送荔枝供她享受。杜牧之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漫指的这件事。

宋驿制度大致因袭唐代，但是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军卒代民役”，原来属于徭役的，现在改由兵士充当驿夫了，这在中国邮驿历史上，是一个重大改革。另一是在马递步递之外，又新创设一种昼夜兼程的“急递铺”。这是一种专用的军邮。由于宋朝一直受辽、金和蒙古的侵凌，国势远不及汉唐，邮驿规模也较小。可是过去的邮驿，只限于皇家御用，到了宋朝就比较开放了。一千零三十六年（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然而能够附递的还是那些官宦士绅，一般劳动人民仍然没有份。象丁晋公、蔡君谟进大小龙团（茶），钱惟演进牡丹，都由官驿递送。陆放翁诗：“日暮坐柴门，怀绝方炳行，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就是指的官递附书。

蒙古侵入中国，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地跨欧亚大陆。疆域既广，邮驿的规模也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按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述，当时全中国有驿站一万所，驿马二十万匹，每站相距三十五里，中间还有旅舍，费用浩大。“元史”也载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帐供，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集，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为盛。蒙古语。元代邮驿叫“站赤”，这是蒙古语“驿传”的译名。有陆站、水站、马站、狗站、牛站、轿站及步站。除了“站”“赤”之外，还有急递铺兵的制度。这个制度创始于太和六年，从燕京至开平（即上都），又从开平至京兆（长安），根据

地理远近，人数多少，建立急递站舖。每舖间隔十至三十里，十五里不等。舖設舖司管理，传递文件用舖兵。舖兵传递文件时，腰里都繫着铃，昼夜兼程。路上行人听见铃声都要避让，舖里的工作人员听到铃声就出来等着，文件一到马上转递，每昼夜行走四百里，速度很快。传递圣旨的马速，插一面小黄旗在衣领之间，老远就可以辨认出来。圣旨封在盖印的小箱里沿途换马接力，丝毫不停。后来急递舖又改名通逕舖。到英宗的时候，每十舖设一个邮长管理。

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明朝疆域虽不如元代，邮驿的规模也比较小，但是邮驿网还是有所发展，驿站设在京城的叫会同馆，在外地的叫水马驿并递送所。会同馆先设在南京，到永乐年间改设北京，分南北两部，北馆六所，南馆三所，设大使一人，副使两人管理。水马驿递送所分设在各地，专门递送俊客，飞报军情，转送上贡物品及军需品。根据所在地的重要与否，配备车马船只夫役。在交通要道配备八十，六十或三十匹马。一般非冲要地区配备二十，十或五匹马。水驿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或七只，五只不等。明代海外交通较盛，象“三宝太监下西洋”及“郑和七次出使南洋”，对促进邮驿交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5年），适应官府幕友和商人的需要，产生了一些商业性质的民信局。除了为商人、幕友服务，也给一般人民群众寄递信件。已

襄和汇兑银钱。这是属于私邮范围的，当时与驿站制度同时并存，到清末发展最盛。到1934年底才最后取消。

清代邮驿制度，大致沿用旧有的制度。分铺递和驿递，铺递利用铺夫、铺兵传递公文；驿递用马传递，除了公文之外，还护送官物和官员。驿站的设置根据道路及地区的冲僻适当确定。铺递组织有铺司、铺夫、铺兵等，象当时山东章邱县就设了东关、山头店、炭张、温家庄，二十里，柳塘口，旧军等七铺，有铺司铺兵等二十八名。曲阜县设城内、旧城、河滨、颜家楼、八里等五铺共有铺司、铺兵十六名。驿递组织有驿书、驿皂、马夫、善医、杠抬夫、水驿夫、驴夫及骡夫等，象当时比较冲要的齐河县驿和它所管辖的晏城驿，就有黑马三十四匹，驿马四十四匹，马夫三十五名，抄牌一名，飞递公文马夫二名，药材医善夫名，白夫一百名。青城县设有驿站，有黑马三匹，马夫二名半，白夫五名。当时，管理邮驿的机构，在北京设有皇华馆，直属兵部，特设一个车驾司，主管所有京外的邮驿事务。在京内又设了考签供应夫马的马厂和专门收发内廷交寄文件及各处递驿送呈的军报票摺的捷报处两个机关，同时，又由兵部派遣十六个提塘分驻各处及黄河、运河一带，由各处按察史管理。凡是自北京寄各处的文件，先由车驾司检验盖戳，转送捷报处，再由马厂预备夫马，从北京送到首站。当时首站有两个，东路是通州，西路是良乡。

由这而站依次递送。由各首寄北京的文报公按这个办法，由提塘寄给首站，再由各站递送到北京车驾司，然后分送各署。驿站的名称，山东和内地各省都叫“驿”，像历城的潭城驿、龙山路，滕县的滕阳驿、临城驿。从北京北出张家口去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驿站，都叫“军台”。从嘉峪关到新疆的过去叫“赤台”，建立行省以后，“塘”“台”兼设。从打箭炉入西藏的叫“站”，吉林、黑龙江也叫“站”，“站”是“传”的变音，是沿袭元代“站赤”来的，是专为传递军事情报用的。甘肃一带也叫“所”的，这是沿用“提辖所”的旧称。各地驿站都由北京华皇驿出发，到山东的邮递驿道是东路；到盛京的是东北路；到河南的是中路；到山西的是西路；到张家口的是西北路。由盛京去吉林、黑龙江，由张家口去库伦，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其余各省及青海、西藏由山东、河南、山西分辖，由山东去的有两路：一到江宁、安徽、山西、广东；一到江苏、浙江、福建。河南也有两路一去湖北、湖南、广西；一去云南、贵州。由北京到山西有两路：一径居庸关外；一由正定越太行山。再由山西去陕西、甘肃、四川以及由甘肃到新疆、青海、西藏；或由四川去西藏。驿道里程以北京至各直省督抚，关外将军都统及蒙藏办事大臣驻地为准；北京到直隶三百三十里；到盛京一千四百六十里；吉林二千八百八十里；黑龙江四千一百二十七里；山东九百二十里；山西一千二百零五里；河南一千四百

百九十里；江宁东路二千五百五十七里，中路二千二百九十五里，水路二千八百七十里；江苏二千七百三十七里，水路三千九百里；安徽二千六百十五里，水路三千四百三十里；江西三千二百二十五里，水路四千零九十里；福建四千八百六十二里；浙江三千一百十七里，水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里；湖北二千七百七十里，水路四千三百三十里；湖南三千六百七十里，水路五千一百九十里；陕西二千四百七十五里；甘肃四千零三十五里；四川四千六百七十五里；广东五千六百七十里；广西四千九百零九里；云南五千九百三十里；贵州四千七百七十五里；新疆八千六百八十九里；西藏一万零九百二十里；库伦三十八百八十里；科布罗六千二百八十里；乌里雅苏台四千九百六十里。凡由驿站传递的公文必须使用马封，附粘排单，注明沿途经过的驿站名称。递送文件时，由各站签注到站时日。如果延误，根据排单上注明时日每驿革以处分。加急公文驿卒每天要走三百里至六百里，因此有加急六百里之说。这种传递紧急公文的驿卒腰间繫铃，行人听到铃声让路，驿站听到铃声派人出来接班，换人换马，公文不行，昼夜兼程。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清朝光绪皇帝西逃的时候，就是用的这种加急文书调兵。

清代驿站制度在光绪以前比较完备，后来驿政废弛，边防败坏，驿站军令空存形式，甚至有的站台没有写必要的时候催民马充数。1876年（光绪二年）各

地官府又在驿站之外另设文报局，把寄往出使、外国钦差的文报，递到上海，交由外国轮船传递；并且以上海转递进口文报，基本上代替了驿站传递制度。1896年（清光绪22年）前清邮政建立以后，文报的传递已经逐步改由邮局办理，驿站更是名存实亡，事实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到了1898年，所有文报除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各直省外，其他各省全交邮局递送。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便全部由邮局承担下来了。当邮传部接收全国邮政时，曾经提出裁撤驿站，因为陆军部反对，没有实行。后来邮局普遍设立，驿站经费开支浩大，财政又非常困难，陆军部放弃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就在1911年7月由邮传部奏准清廷，决定“裁驿站归邮”。不久因武昌起义，时局动荡，只有湖南、江西两省实行，山东和其他各省都没有裁撤。1912年（民国元年）7月驿站事务全部由邮局接管，山西、新疆、安徽、江苏、福建五省都相继裁撤，山东也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将旧设驿站裁撤。别的省份到1913年（民国二年）才全部撤销，但是外蒙古、青海、西藏的边远地区，还残存着一部份驿站遗制，有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邮驿制度到这才告结束。